

世

THE
WORLD
OF
YUAN LONGPING

界

的



袁隆平

袁隆平 的 世界

陈 启 文 著

THE
WORLD
OF
YUAN LONGPING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袁隆平的世界 / 陈启文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404-7898-8 (2017. 4重印)

I. ①袁… II. ①陈…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15911号



YUAN LONGPING DE SHIJIE

袁隆平的世界

陈启文 著

出 版 人: 曾赛丰

选题策划: 龚湘海

责任编辑: 龚湘海

封面设计: 萧睿子

版式设计: 周基东工作室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印刷

2016年12月第1版第1次 2017年4月第2次印刷

开本: 970 mm×670 mm 1/16

印张: 31.25

字数: 45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404-7898-8

定价: 42.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录

引 子	001
第一章 人就像一粒种子	014
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	014
汉口时间	024
另一种血脉或基因	033
第一志愿	049
第二章 隐蔽的地平线	065
隐蔽的地平线	065
我有迷魂招不得	073
饥饿的小提琴	089
第三章 神奇的发现	098
一个假设，或一个猜想	098
神奇的发现	112
终身大事	118
关键的第一步	129
第四章 追逐太阳的人	136
第一幅蓝图	136
风暴中的秧苗	144
追逐太阳的人	155
山重水复	166
第五章 第五大发明	177
从转折点 to 突破口	177
一闯三系配套关	188
二闯优势组合关	197
三闯制种关	205
第五大发明	216

第六章 中国独创	225
大道至简	225
当热潮遭遇寒潮	231
中国独创	241
第七章 第三次飞跃	249
警世的呼唤	249
第三次飞跃	258
在危机中挺进	268
袁隆平的梦	280
第八章 舌尖上的安危	290
多事之秋	290
舌尖上的安危	298
对转基因的一次小心求证	312
人在做，天在看	332
向极限挑战	345
第九章 人类的福音	359
杂交水稻之父	359
第二次绿色革命	369
人类的福音	380
杂交水稻之子	391
爱与拯救	415
第十章 还原袁隆平	422
爱是一生的承诺	422
心灵富豪和荣誉之王	439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449
稻田里的雕像	459
后 记	478
附 录	486
袁隆平年表	486
主要参考书目及文献	493

引 子

从长沙市中心朝着浏阳河的方向一路东行，繁华渐远而节奏放缓，我的脚步在这里慢下来。一条穿过时空的河流依然清晰，那是一种不受时代限制的存在。浏阳河，九道湾，在流经长沙市芙蓉区、注入湘江之前拐了一道大弯，马坡岭，就在这个水汽充盈的河湾里。这是一道绵亘于长沙东郊的低矮丘陵，原本是远离闹市的荒郊野岭，如今在不断扩张的城市版图上，已为傲岸而又炫耀的高楼大厦所遮蔽，然而一旦深入，就会发现，它并未消失，那一片洇染而出、弥漫而来的绿色汁液，在城市的皱褶中愈发显得鲜亮而灵动，我那高度近视的双眼感觉越来越亮了。这一小片被绿色所渗透了的土地，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恍若隐藏于城市背后的另一个世界。

我三番五次探访马坡岭，每次都在三伏天，正是水稻扬花灌浆的季节，而这儿还有着一片稻田，在一座省城，这几乎是绝美的风景。这里

的每一条路，仿佛都是从稻田里延伸出来的，只要不迷失方向，你就会和一个伟大的灵魂走在同一条路上。我反复辨认着一个个路标与站牌，这里的路线还真是错综复杂，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和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河湾与丘岗之间构成了一个“农”字当头的金三角。如果问路，十有八九会被指错方向，一般老百姓也不知道哪跟哪，而一个杂交水稻之父的名气实在太大了，他们以为这一方水土全是袁隆平的地盘，只要带个“农”字的地方都是他管着的。我第一次来这儿就被指错了方向，从农大到农科院拐了好几个弯。来过几次了，渐渐便有了经验，只要看见那片长势特别好的稻田，就再也不会走错了，那是袁隆平的中心试验田。紧挨着这片稻田，那一片绿得最葱茏的地方，有一道几乎被树荫遮蔽了的大门，就是中心大院。左一个中心，右一个中心，在这儿其实是具有双重意义的特指，就像门口那两块牌子，一块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一块是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袁隆平多年来一直担任这两个中心的主任。由于两个中心的名字太长，老百姓有点叫不过来，也难以记全，便很干脆地把这片试验田直呼为中心试验田，把这院子叫中心大院，又把两个中心合称为“杂优中心”。约定俗成，大院里的人也是这样叫的。这样叫其实也不错，这里就是湖南、中国乃至世界杂交水稻或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中心。

我第一次走进马坡岭，是2009年7月，那时我正在采写一部以粮食为主题的长篇报告文学，袁隆平和杂交水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篇章。那一次我就领会到了，要对他老人家做一次访谈可不容易，我在3月份惊蛰刚过就开始联系，可他实在太忙了，自从投身杂交水稻研究后，数十年来，每年他都像追逐太阳的候鸟一样，在湖南、海南两地奔波育种。一个农业科学家，不是活在二十四小时里，而是活在二十四节气里，追着农时走。那时，按照袁隆平提出的“杂交稻育种三步走的战略设想”，早已从第一阶段的三系法迈进了第二阶段的两系法，而且跨入了两系法的升级版——超级杂交稻时代。在连续攻克中国超级稻第一期、第二期目标后，他正率协作攻关的科研团队向第三期超级稻目标发起攻关。几

个月来，我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面对面地采访他的机会，几经周折，经袁隆平先生的秘书辛业芸博士安排，我才终于有了一次采访机会。

当我从另一座城市赶到火炉长沙时，已经踩在7月的尾巴梢上了。大暑已过，正值中伏，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也是水稻长势最旺的季节。马坡岭当时还下着雨，但雨水浇不透逼人的暑气，反而漫出一股如蒸笼般的热气。袁隆平先生比预约的访谈时间迟了一个多钟头，尽管多年未见，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哪怕从未见过，你也能一眼认出他。这副面孔，这个形象，以那瀑布般的杂交水稻为背景，已经成为世界上传播率最高的中国形象之一。这年，袁隆平先生已年届八旬，他刚去田里看过稻子的长势，进门时，他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也许是汗水，一边露出了他那标志性的“刚果布式的笑容”，——由于长年累月扑在稻田里，他老早就得了一个“刚果布”的外号，那脸颊黑而瘦削，一笑，露出满口雪白的牙齿，像刚果布的黑人一样率性、淳朴而快乐，有人便把他的笑称作“刚果布式的笑容”。我也觉得他这外号、这笑容挺传神。一个人，一辈子，该要吸收多少阳光，才会变成这样一个“刚果布”的形象，一副如同黑釉般透亮的脸孔，那犀利的眼神，依然透彻着内心的明亮。阳光不仅塑造了一个农学家特有的形象，也赋予了他伟大的头脑和灵魂，我感觉他的血液和骨骼都已被阳光深深地渗透了，那刚毅的、健康的色泽，不只是来自阳光的直射，他本身就是一个发光体，浑身都在焕发出内在的光芒。

采访之前，辛业芸已给我打过招呼，“有么子问题你直接提出来就行了，袁老师说什么从来不打草稿，他是‘老演员’，不需准备……”她这话似是半开玩笑，却又格外认真，那笑意中还透出几分苦涩。我一听就有几分惭愧，真不该来打扰袁老师啊。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我和他面对面的访谈，没想到，袁老师一进门，呼啦一下就被一大群拥上来的记者给包围了，那摄像、照相、录音的长枪短炮顷刻间就塞满了他那间并不宽敞的会客室，我被挤进了一个角落，连袁隆平先生的面孔也看不清。不过这位睿智的、善解人意的老人，又打着手势把我叫到了离他较近的

一个位置。一个上午，从中央电视台到湖南卫视，包括我在内，这么多人围着他，沉闷，憋闷，喘息，这让老人怎么受得了？实话说，连我也受不了，但他却必须自始至终地面对镜头，一道灯光一直明晃晃地罩在他的脸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第一千次讲述，而他每说一句话，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甚至会引起争论的焦点。令我感动的是，他一边对着摄像镜头回答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边转过身，扭头朝我这边张望，偶尔还冲我点头微笑，他生怕冷落了任何一个人。一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双阅人阅世八十载的眼睛，依然有一种不染尘埃的纯净，哪怕瞬间的掠过，也让我有一种被照亮的感觉，让我升向一个明净之境。

对于我们，袁隆平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又是一位陌生的熟人。熟悉，只因他离我们的饭碗太近，尤其是我这种乡下人，感觉他就像一个在我们身边的稻田里忙活的农人，一如我们的父老乡亲、衣食父母。陌生，只因你还不了解他，哪怕天天与他打交道，你也觉得眼前这位老人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当时，有个记者就忍不住说：“真没想到，您和那个课本里的杂交水稻之父完全不一样啊！”袁老就故意板起一副深沉而严肃的面孔问：“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搞研究的都是这样子啊？”这句话把很多人逗乐了，袁老也乐了。

如果你看见了一个真实的袁隆平，还真是很难把他和你想象中或印象中的那个“杂交水稻之父”看作一个人，这可能是在媒介传播中造成的失真。很多人都觉得，在袁隆平身上有两个“对不上号”，也可谓两个不对称，一个是他的学历同他崇高的科学地位对不上号，一个是他那模样和知识分子形象也对不上号。袁隆平也确非那种学院派或实验室里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他身上几乎感觉不到什么书卷气息和学院情调，更没有一点大科学家的模样。其实，这两个“对不上号”恰好最真实地反映出了一个最逼真的袁隆平，也可以说是农业科学家的共同特征。我见过的很多农学家或农业科研人员，包括袁隆平的助手和学生，一个个都是浑身黝黑、大手大脚，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个模子就是天地和

田野，若要用一个最准确的词语来形容他们，那就是天地造化。当你注意到袁隆平的两个“对不上号”时，你会发现，他还有一双特有的大手和大脚，这和他瘦削的身材也有点不对称。

若要真正认识他，兴许就要从他这双手开始。那手掌特别大，轻轻一握，就让我直接感到了一股如我那农民父亲般的力量，却又厚重而温软，没有农民手中那种粗粝而突出的老茧。这让我找到了对这双手的最真切的把握，这绝非一双普通农民的手，而是一双创造了无数奇迹的科学之手，那一粒粒神奇的种子，就是通过这样的一双手来显示的，如今，这双阔大的手，早已为人类世界撑起了一片辽阔的天空，你甚至觉得这只是会变魔术，又不知他到底有什么魔法。

这双大脚，是他几十年在水稻田埂上跑出来的，不知又要跑烂多少双鞋子了，但越跑脚板越大，越跑越结实，比最结实的鞋子还结实。有时候，鞋底跑掉了，他就干脆光着一双大脚板。一个泥腿子科学家的形象，就是这样形成的。有人曾经估算，若把他这辈子跑过的田埂连接起来，足以绕地球几圈了。

这样一个人，最适合他的地方还是稻田，他最大的心愿也是在有生之年为人类再多打一些粮食。但一个人活到了他这样大的年岁，却依然不能按自己的心愿而活着，这无疑是一个老人的苦衷，更是我们的错误。当时我真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是否过多地打扰了这个老人忙碌而又有规律的生活？他也一再直率地表示，他最不想接受的就是采访啊采访，每天都有人纷至沓来，没完没了的采访，还有没完没了的问题，可他又无法拒绝。无法拒绝，其实也是一种理解，这么多人来找他，围绕着他团团转，只因谁都绕不开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又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这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早已设问又直接回答了一个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追溯起来，2009年三伏天的那次采访，并非我第一次见到袁隆平先生。早在三十多年前，我还曾在家乡的稻田里有幸见过他一次。

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高中生，当时还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代，我们公社有一个直属农科队，从1978年就开始试种杂交水稻，那片稻田是我上学路上的必经之地，一天中午，我看见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汉子，正手把手地给社员们传授一种奇异的种稻技术，我也从老乡们的口中第一次听说了他的名字，袁隆平。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把一支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叼在嘴上，笑咪咪地望着那片稻田。这就是我对袁隆平的第一印象，而更深刻的记忆还是曾经的饥饿和对饥饿的恐惧。

我虽说是一个乡下人，在远离了故乡之后，却没有多少所谓乡情或乡愁，更没有感觉到什么田园诗意。我一直觉得那只是诗人的幻觉，而对脸朝黄土背朝天、躬耕于垄亩的农人永远只是如同苦役般的劳作。我父亲是一个种田的好把式，还当了几年生产队长，只有偶尔想起他打着赤膊、赶着水牛耕耘的样子，才让我仿佛重返了童年故乡的旧时光。我父亲就这样耕耘了一生，而我永远忘不了一个农人脸上那几乎麻木的沉默和像牛一样沉重缓慢的脚步。作为一家之主，他只有一个梦想，让一家老小都能吃上一碗安乐茶饭，然而这样的梦想在他大半辈子里却一直是奢望。作为一队之长，他只有一条底线，不能让生产队里饿死一口人。这很不容易，一个农民从生到死就是为一碗饭而活着，若能在咽气前吃上一碗大米饭，就是享福了。我祖父死在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在临终前，他一直咽不下一口气，几番挣扎，几次回光返照，那深陷的眼窝像两个干枯的空洞，却又透出一点儿时明时灭的光亮。我父亲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就是想在闭眼之前吃上一碗大米饭，可翻遍了家里的仓底，也没有找到可以煮一碗饭的米粒，一家人用来果腹的，只有地窖里的红薯和在太阳下晒得发白的红薯干。其实，我们生产队的仓库里还有一点稻

子，可那是种子，一个生产队长去借一碗稻子来，给一个临终的老人吃，应该是可以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我父亲没有去借，哪怕是满足他亲生父亲的最后一个愿望，甚至有可能救回一条老命，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借口。当我祖父同死神拼命挣扎时，我不知道我父亲的内心是否也在挣扎。而我祖父也许从他亲生儿子那冷酷而决绝的眼神里看清了让他绝望的东西。当我父亲把一碗刚熬出来的红薯糊糊端过来时，他不再徒劳地挣扎，把一口气死死地咽了下去，而那只饭碗不知是从我祖父还是我父亲手里失手落在了地上，摔成了一地碎片。严格说，我祖父并非饿死的，毕竟那时候还有吃的，红薯或红薯干也能当饭吃，只能说他的愿望超过了现实。

同祖父相比，我算比较幸运了。我是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这让我侥幸逃过了那三年饥荒岁月。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乡下人的日子已有所好转了。为了能多打几粒粮食，每年春节刚过，我父亲趁着肚子还饱，还有点油水撑着，就带着社员们下田了。江南早春的水田里还敷着一层薄薄的冰壳子，那腿被冰水一激，冷得抽筋，但他们干得越来越来劲，头上开始冒热气，鼻尖上暴出一颗一颗的汗珠。干到半晌午时，像我父亲这样强壮汉子们都脱掉了老棉袄，汗水顺着他们冒着热气的脸颊滚滚而下，连埋头耕田的牯牛也不断舔着鼻尖上的汗水。还记得我几岁时，时常爬到家门口的水杨树上朝田野那边张望，远远望过去，我父亲和那些农人强壮的身影突然变得十分渺小了，像一只只黑黑的、正在忙忙碌碌地觅食的蚂蚁一样。若从生存的本质看，人跟蚂蚁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每个生命都在凭着求生的本能在劳作，在与饥饿与死亡本能地抗争。我家乡地处洞庭湖和长江中游交汇处，是一片深厚而肥沃的冲积平原，然而在这样的良田沃土上，我父亲带着那么多壮劳力一年到头勤勤恳恳地耕耘，每年打出来的粮食却是那样少。而对于我们乡下人，从来没有春风沉醉的夜晚，只有青黄不接的饥馑。每到三伏天，仲夏夜，在水稻抽穗、扬花、灌浆、结实季节，那样酷热的夜晚才是让农人们沉醉的。而我对故乡的忆念，只是一片魂牵梦绕的稻田。

在我通过高考走进城市之前，我在乡下度过了十七年岁月。身为一个农家子，我在寒暑假和农忙季节也要干农活，插秧薅草，挑粪积肥，割禾打谷，我都一一干过，这让我本能地懂得了稼穡之艰辛，也是为了日后一辈子务农而提前苦练一身本领。再苦再累，我都能挺过去，但饿肚子却是无论如何也挺不过去的。我虽说没有经历过致命的饥饿，但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也过着饥一餐饱一餐的日子，能够吃上一碗大米饭，那是乡下人过年过节时才有的奢侈的享受。那年头，乡下人吃饭都是“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即便是干饭，也要掺杂豌豆和红薯干，更多的日子则是南瓜、芋头、萝卜、白菜帮子煮稀饭，用乡下人的土话说就是“煮个稀巴烂”。如今，这种粗杂粮已是城里人津津乐道的绿色健康食品了，可一天三餐让你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让你吃，你试试看。对这种食品是否健康，我一直都很怀疑，譬如我们这一代人，长年累月吃这东西却营养不良，大多长得比较矮小，而一旦能吃饱肚子了，又会条件反射般的长膘，拼命储积脂肪，这其实也是人类应对饥饿的一种本能的生理反应。

这儿言归正传，还是回到杂交水稻上来。在杂交水稻推广之初，普通生产队种的还是普通水稻（常规稻）。我们生产队是普通生产队，和农科队只隔着一条田埂，但我父亲这个生产队长，刚开始一点也不羡慕人家农科队，觉得那样播种、移栽太麻烦了，还觉得特别好笑，可到了收割季节，我父亲他们傻眼了，那简直连瞎子也能看见啊，人家农科队的稻禾比我们生产队的要壮实得多，那稻穗比我们队也要沉得多，我父亲还跨过田埂去数过了，不但结实多，谷粒也更饱满圆润，几乎没有秕谷。等到收割之后，更是让他震惊了，人家一亩田打出来的干谷抵得上我们队两亩田的收成，若能多打这么多稻子，再麻烦也值啊，同样的一亩田，要多养活好几口人哪！我父亲算产量账，从来不只是看斤两，而是看能养活几个人，而一亩田能打多少粮食，还真是要用人口、用生命来直接换算的。

在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1979年，我们队也种上了杂交水稻，但在

高考来临之前，那一茬稻子还没有收割，粮食依然不够吃。我们毕业班的学生在放月假时才能回家里背一次米，然后自己划算着怎么才能吃上一个月。虽说高考在即，但我也享受不到一点儿特殊照顾，我父亲无论当队长，还是当家做主，那都是铁面无私，一碗水端平。那时在乡下还是用升子量米，我母亲每次煮饭，用升子量好米后，又要抓出一把放在一只瓦罐里存着，这节省下来的米，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用来防身保命的。但我们家掌管粮食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每次回家背米，我父亲都是一升一升地量的，而我正是吃长饭的时候，家里给我的米我从来没有吃饱过，每次出门我都要磨磨蹭蹭，等我父亲出门了，我就会偷偷往里边再加一升，尽管是偷家里的粮食，感觉也跟做贼一样。我父亲深知家贼难防，一直像防贼似的防着我。有一次我刚刚侥幸得手，背着米袋正要溜出门，却被我父亲逮了个正着，他把我袋子里的米又倒回了米缸，然后又一升一升地重新量过。他这样干的时候，一声不吭，毫无表情，这让我更感到了父亲的内心是多么冷酷，他的心真比生铁还硬。当我背着米袋重新出门时，也像他一样一声不吭、毫无表情，说不恨他那是假的，那时候我还真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亲生的。后来，我才慢慢觉悟到，残酷的不是父亲，而是饥饿和对饥饿的恐惧。我们家兄弟姊妹多，个个都在吃长饭，谁要多吃多占，一家人都要挨饿了。

更要命的是，就在我参加高考的那个月，我把一袋米从家里背到学校时，天黑了，学校食堂管理员下班了。我只好把米放在寝室里，用被子捂住，还伪装得挺仔细，看上去就像一床来不及叠好的被子。上完晚自习，我几乎是跑着回寝室的，还好，那被子还是原来的样子，可一掀开，我两眼一下就空了，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我那一个月的大米被偷了，这可真是了了我的小命了。眼看就要高考了，而我就算再回去背一次米，我那心狠如铁的父亲又肯不肯给我呢，就算给，一家人都要饿肚子了。有生以来，我还从未如此强烈如此直接地感受到饥饿的恐惧，没饭吃，不说一个月，连一餐也挨不过去啊。幸好，我有一个挺铁的哥们是农科队的，他从家里给我背来了一个月的米。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还他的

米，这是我欠他一生的债。几十年过去了，多少人，多少事，我都淡忘了，但我一直铭记着我这个老同学的名字，张腾云。他能给我送来一袋救命粮，又搭帮他们农科队种上了杂交水稻，多打了一些粮食。他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第一志愿就是农业院校，我不知道他的志愿与让他们吃饱了肚子的杂交水稻有没有关系，但我知道，他从农校毕业后，一辈子也扑在稻田里了。

对于我，1979年是一条人生的界线。通过高考，我进入了城市，我的身份被彻底改写。商品粮，城市户口，以及基本上已成为事实的干部身份，让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新从娘胎里出来了一次。当我在稻田里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父亲依然毫无表情，却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他说，这伢子终于找到自己的饭碗了！而背后其实还有一句潜台词，这家里、这队里，从此少了一张吃饭的嘴。而我获得的这一切，在1993年我又以决绝的方式放弃了，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次重要转型，我辞去了公职。在我做出这一疯狂举动的那一刻，我才猛然悟到，我敢于放弃这一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再为吃饭而犯愁，中国已进入了一个丰衣足食的时代，一个告别了粮本和粮票的时代。我感到一个真正的我诞生了，满心的自由欢畅，而我父亲却没有我这样乐观，他捶胸顿足，唉声叹气，“孽种啊，孽种啊，你怎么把好端端的铁饭碗给砸了啊！”

在乡下人看来，人这一辈子就是在饭碗里度过的，一旦放下了饭碗，你这一辈子就走到了尽头。若要理解袁隆平和杂交水稻，其实也是从一只饭碗开始，袁隆平先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

如果不是用生命去体验过饥饿的滋味，如果不是直接感受过饥饿的威胁与恐惧，我兴许不会从虚构向非虚构转型，投入大量精力采写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我曾说过，在年过不惑、走向天命之际，我越来越觉得“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又有什么比粮食更重要？又有什么比它同生命的联系那样直接、那样紧密？粮食是无法虚构的，生命是无法虚构的，“粮食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粮食，而是历史演进的规律、民族兴亡或兴衰以及生命的无穷奥秘所构成的自然与文化的混合体。它是每一个生命最基本的需要，也是历史的最直接的载体，它内部包含着巨大信息量，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超越，如果说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粮食就是它最基本的底线”。——这是我在《共和国粮食报告》后记中的一段话，也是我选择粮食这一主题的最直接的原因。在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的背景下，在美国人布朗“谁来养活中国”这一警世的呼唤下，我几乎是在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驱使下，选择了这个主题，人间食粮，天下大命，这是一个世界性、人类性的永恒主题。

但又说句实诚话，我在2009年夏天采访袁隆平先生，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采写《共和国粮食报告》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篇章。在此后的数年间，我并没有为袁隆平和杂交水稻专门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的打算。当湖南文艺出版社提出这一选题，希望我来承担这一创作重任，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不是不愿接受，而是不敢接受。我预感到这是一次难度极大的写作，已有那么多同一题材的著述摆在那里，“前人之述备矣”。如果你不能给读者挖掘出一些新的东西，换句话说你若不能超越那么多同类项，那只能是徒劳的重复或复述。而从我第一次采访袁隆平先生的经历看，他老人家如今年岁更大了，我实在不好去打扰他。另外，还有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对于杂交水稻这一农业领域的尖端科学，我完全是一个门外汉，而在叙述中必将遭遇大量的专业术语、科学数据，这在叙述过程中是绕不过去的，一旦绕开就失真了，甚至是根本性的失真。

我一直在犹豫，而出版社一再向我发出恳切邀请，在反复思考之后，我最终硬着头皮应承了，那就试试吧。让我应承下来的一个原动力，还是那段苦难和沉痛的岁月，那是属于我生命的最深刻的体验，没有任何痛苦可以超过饥饿和对饥饿的恐惧。

从2015年夏天到2016年夏天，我两次走进马坡岭进行长时间的采访，并对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江西、安徽、福建、广东、海南等杂交水稻的主产区、示范片和育种基地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无论杂交水稻王国的疆域有多么辽阔，它的中心就在马坡岭，这一小片灿烂的土地，既是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的根据地，也成了我的根据地。如今，袁隆平先生已八十七岁高龄了，他在2014年秋天已攻克了中国超级稻第四期目标，亩产突破了一千公斤大关，登上了水稻王国又一个无人登临的高峰。就在这两年里，他又向中国超级稻第五期目标发起了攻关。然而高处不胜寒，一直以来，但凡与杂交水稻有关的事物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种种质疑和争议，几乎都会牵扯到袁隆平这个主角。我既不愿参与那些充满了噪声的争论，也不做先入为主的判断，在搞清事实真相之前，我也做不了任何判断。作为一个事实真相的追溯者，我一直恪守着自己的立场，将自己所了解的一切诚实地向读者报告，这正是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这既是本书的定位，也正是我投入此次写作的意义所在，那就是对袁隆平和杂交水稻探索之路的来龙去脉进行一次清晰的梳理，对一些争议的症结或焦点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刻意地回避，一旦回避这部作品就将失真或部分失真。

我觉得对袁隆平和杂交水稻这么多年来走过的路，有必要做一次重新审视，或许还会有新的发现。袁隆平先生也时常回首他这么多年走过来的路，他从而立之年投身于杂交水稻研究，到四十不惑时终于蹚出一条路来，一路攻克三系法、两系法杂交水稻的关键技术，在年过古稀后，他又向中国超级稻发起攻关，如今他早已迈进了八十耄耋之年，还在一次又一次地向世界水稻史上的一座座高峰发起攻关。“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夫子说这话时才六十三岁，而